



【城市地理】邂逅老商埠的一个午后

□陈忠

那天从济南火车站回家，抬头看见华夏书信文化博物馆时，突然就有了想去老商埠走走的念头。

蓦然间，迎面走过来一个清秀的男子，中等身材，身着青色的唐装，头上戴着一块蓝底白点的无缝头巾，后面垂下的部分打了个结。他微笑地看着我。我还没想起他是谁，便听他说：陈老师，你不认识我了？六年前，在音乐酒吧，想起来了？见我还在苦想着，他接着说，那天有场诗歌朗诵会，是纪念徐志摩的。我一拍脑门：哦，想起来了，你是山师大的小杜？他略微激动地点点头：没想到六年后，我们能在这里相见。

六年前的一个午后，胡霞、方言、杨波、虹云等电台的几位播音员、主持人和几位诗友聚集在一家音乐酒吧，举办了一场关于雪茄、诗歌、徐志摩的诗歌朗诵会。那天朗诵会结束后，大家分散在各个角落，喝着咖啡和红酒，聊着诗歌和远方。我刚点着一只粗大的巅峰6号雪茄，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怯生生地坐在了我对面的座位上。他自我介绍是山师大的学生，偶然路过音乐酒吧，被德尔德拉的《纪念曲》吸引而来。

闲谈中我得知，小杜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济南，曾在培训机构当过教员，跑过外卖，干过公司文秘，在小剧场串演过群众演员。两年前，他和两个学长合伙成立了一家文化策划公司，生意做得不大，马马虎虎能维持生计。

我问他怎么没想回烟台发展，他说他挺喜欢济南的，一来这座城市有水一样的包容性，二来这里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挺适合写作的。他沉思了片刻，热切地告诉我：一年前，他突发奇想，想在老商埠做一场“穿越”式的演出，展示百年前济南老商埠的时尚和风情。让观众与在传统剧场的体验不同，他们不再是局外人，可以在街区或某个建筑内自由行动，体验每个角落发生的故事，或在酒吧、或在音乐厅、或在某个阳台、或在某个老式建筑前，每一个演出区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观众不仅能听到、看到不同的人物故事，还可以和演员一起共唱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歌，整场演出用旁白和音乐进行串场和互动。

你是说，像武汉知音号游轮那样的演出模式？

对，可以说是借鉴。一开始就是火车的汽笛声，在白色的蒸汽中，出现1904四个大字，然后，让与济南老商埠有关的历史人物都一一亮相，像孙中山、袁世凯、周馥、杨士骧、孟洛川、张采丞、乐镜宇、甚至可以让蔡公时、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胡也频、丁玲、胡适、柳亚子、老舍等与济南有关的历史人物，也陆续出场。他们在老商埠区，不再是一个个孤独的人物形象，更像是一束束光聚拢在一起，呈现出他们曾经在济南、在老商埠发生过的革命、创业、爱情、别离、殉难、演讲等故事和片段……

观众还可以在演出前，从服装租赁区租上自己喜欢的服装和道具，像夹克、连衣裙、马褂、坎肩、油纸伞、老式唱机、西装、礼帽、文明

棍……这既能让观众融入演出场景，又能促进消费，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这种“沉浸式”的演出。

他越讲越兴奋，仿佛7号建筑前只有我们两个人。

隐约间，我看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徐志摩，正坐在一间酒吧的高脚凳子上，风度翩翩地抽着雪茄，在曼妙的音乐中自言自语道：燃灰白如雪，烟草卷如茄。

转过身，又看到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小石楼，楼梯上站着那位在济南老商埠区崛起的商业大亨张采丞，小石楼不远处，就停放着他那辆仿造的“济南第一辆老爷车”。

附近的街区，穿梭着卖报的小报童、卖香烟的小贩、穿旗袍的淑女、夹着油纸伞的教书先生、提着旅行箱的绅士、坐人力车的外国商人……

我甚至看到了德式尖顶建筑里的宝隆洋行济南分行经理客厅中间的黑色椭圆形餐桌，桌上铺着碎花桌布，一只波斯猫，静静地趴在左边的椅子上。桌子中央一瓶含苞待放的水仙花散发着幽香。靠墙立着一架原木色的钢琴，旁边壁炉里轻扬着红色的火苗，后面衣架上挂着一件青花的旗袍，旗袍上披着一条白色的披肩……

目光移落在了对面餐厅前一尊女性铜雕塑上，行走的姿势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生动而迷人……我看一个在商埠区义利洋行负责洋行业务的德国青年，他叫卡尔·格拉芙，此时，他遇见了一个叫孟静仪的中国女孩，被她的娴静和美貌所吸引。他们一见钟情了。卡尔·泰克的《格拉芙·齐柏林进行曲》响起，一群青年男女舞者随之舞动起来。空气中舒展着自由、快乐、奔放的气息，一直弥散到了整个商埠区的上空。

脑子里忽然闪出了林徽因的一段语录：有缘的人，无论相隔千万之遥，终会聚在一起，携手红尘。

其实，也不用聘请专业的影视演员，每年从艺术学院招一批舞蹈、声乐、朗诵的应届男女大学生就可。因为不需要高超的演技，而且，大部分演员也没有多少台词，主要是以旁白来讲述故事，推进剧情……小杜的话，将我拉回了现实。

虽有些意犹未尽，但想到还要穿过大半个城市返回奥体中路，我就对小杜说：咱们改日再聊吧。他赶忙起身，说，一起走吧，我还要去幼儿园接女儿。

突然感到有一道夺目的夕阳之光照耀过来，我们不约而同地面朝西天。看见对面的建筑染上一层金黄色的光晕，连同周边的一切事物都愈发显得沧桑而凝重。

“黄昏好美，渐沉渐去的夕阳，总能让人感到一种宁静的美。”小杜喃喃地说道。

是啊，此时的天空，静得就像一个守护着这个世界的处子。

我的话音未落，就听见有火车的汽笛声，从济南火车站那个方向隐隐地传送过来。

(本文作者为济南市市中区作协主席，诗人。)

□冯连伟

我出生的故乡还在，我上小学的村小却在30多年前就消失了。我心里留下了诸多的遗憾，耳旁总是会响起上课下课时一阵阵清脆的铃声。

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我，有幸在我们村里的小学开始了求学生涯。当时我们全村的总人口有五六百人，村小学设在大队的院子里，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的学生有多有少，我们班最多，不足20人。

大队的院子里除了这五间教室，还有大队党支部的办公室，里面放着一张办公桌，办公桌上有一个话筒。院子里有一棵很粗很高的白杨树，树上最高的树杈上安放着两个大喇叭。不仅用来给父老乡亲宣讲政策、提醒村民日常注意事项、对打骂公婆闹纠纷提出批评，还是我们村小做广播体操的重要指挥员，每到课间操的时候，大喇叭里会播放“现在开始做第五套广播体操：预备，开始……”白杨树低矮的树杈上挂着一个铁铃，那时经常看电影《地道战》，每当上课、下课、放学的铃声响起，我的耳旁似乎就响起电影里老村长敲响的铁铃声。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制是五年，但我在村小却上了六年，因为我上了两个一年级。还在我5岁的时候，我娘就给我报上名送到了学校。入学的时候，我不记得穿了什么上衣，但下衣我记得很清楚穿了一条小裤衩。当时我们的老师是大队书记的女儿，她是第一年当老师，年龄也不大。我把小裤衩脱下来拿到手上玩，她又哄着我穿上。其实那时农村小男孩光屁股根本不当回事。

学校的教室是三间草屋，室内坐的是一排排土台子，我们自己从家里带着小板凳（我们俗称“板头”），课本就是语文和算术，课程表上还有体育课、美术课和音乐课。上体育课的是另一个年级的男老师，带着我们到村西头的生产队的打谷场上跑步，让我们高声喊“一二三四”，也做一些“老鹰捉小鸡”、两人一队百米赛跑等；上美术课时，老师在黑板上画鸡狗鹅鸭、西红柿茄子等我们常见的动物和蔬菜；上音乐课是最快乐的，我们都想学一首新歌回家在爹娘哥姐面前显摆一下，教我们音乐课的也是一位女老师，我喊她大姐，她是我们小学唯一吃国库粮的公办老师。

我们村小的老师都是本村的，他们的学历最低的只有小学毕业，就是教我的大队书记的女儿，教了我两年，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她就出嫁了，我就换了一位男老师，是我本家大姑家的儿子，我喊他大哥。我这位大哥虽然是初中学历，但肚子里的学问也不是很高。记得他教我时间不长，有一次他把“谆谆教导”的谆读成“heng”，我就站起来给他说你读错了，让大哥立时脸红得像块红布，丢了大脸面。不过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大哥都快70岁了，和我家是路两侧的对门邻居，每当我回家的时候，只要被他遇见了，总会热情地招呼我：“三弟，今天上我家吃饭吧？我杀只公鸡，咱喝一气。”我的心里总是热乎乎的，虽然我总会想起小时候课堂上那尴尬的一幕。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大哥已经是初中生了。从我上学的那天起，大哥每天晚上都在堂屋的地下摆上地瓜干教我数数，还自制了一块小黑板挂在土墙上教我识字。大哥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而且是一生的老师。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大哥高中毕业也回到村小当了一名老师，不过他一回来就教五年级那个毕业班。我们班当时有两个年龄比较大的就跳到了五年级那个班，我当时是我们班经常考双百的，大哥不同意我跳级到他的班里，但他带着毕业班的全体同学去照毕业照时，却把我带去了。至今有一张戴着红领巾、站在麦地头上的照片被我珍藏着，那就是大哥让人给我照的，过后大哥还让照相馆把这张黑白照片加了颜色。如今看到这张照片，我既怀念那纯真无邪的少年时代，更为大哥对我的呵护关爱而感动。

上小学的时候每年最大的活动就是庆祝“六一”儿童节。我们坊埠学区辖六个大队，每个大队的学生这一天，都会穿上只有过年时才穿的新衣服去参加庆祝活动。我上五年级那一年，“六一”儿童节庆祝大会上学生代表发言的机会给了我，那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面对几百人讲话。所以几个月后我上初中的时候，大多数老师不管是教过我的还是没教过我的，都能叫出我的名字，我想那次发言还是给我带来了放大效应。

如今，教过我的村小的老师已经有三位成了古人，当年的村小也在30年前“撤点并校”的政策下消失了，原来村小的地盘早已成了民居，想找一点点当年村小的痕迹都找不到了。当年无知单纯的小儿也已迈入了老年人的行列，现在回忆一下让自己迈入知识海洋的村小，心中有酸有甜。消失的是村小，留下的是思念。时空飞转，回不去的是旧时光，期待的是明天更阳光更温暖……

(本文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山东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

往事悠悠

消失的村小